

# 论清代地方架阁库的变迁——以浙江为例

韩李敏

(浙江省档案局 杭州 310000)

**摘要** 清初地方各级机构设有架阁库,它们基本都是明代架阁库的遗存。从浙江历史看,架阁库一词,从清中期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册房和书房。

**关键词** 架阁库 册房 书房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18.04.023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Jia Ge K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 Liming

( Archives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0 )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its loc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the Jia Ge Ku (a institution for collecting and managing archives), which were basically the remains of the Ming Dynasty's Jia Ge Ku.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words "Ce Fang" and "Shu Fang" took the place of the word "Jia Ge Ku" from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a Ge Ku; Ce Fang; Shu Fang

在中国古代,架阁库是档案机构和部门的代名词。架阁库始兴于宋代,历经元、明,经久不衰。据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介绍,架阁库直至清朝才退出历史舞台,“清不用宋元明架阁库制度(唯都察院设有架阁库),而基本以档房和清档房作为各机关主管档案的机构。”<sup>[1]</sup>周雪恒先生的判断是基于清朝中央政府实际状况而作出的。近年,马仁杰教授和黄伟先生对清代地方档案机构也作出同样的结论,认为“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设有专门管理档案的档房,主要分为清档房和汉档房。”<sup>[2]</sup>那么,各级地方政府真的是用档房存储和管理档案的?我国已故学者王金玉先生曾提出过质疑,他利用雍正《大清会典》和部分地方志史料,“证明清代架阁库是大量存在的机构”,仍是清代地方档案管理的主

流。<sup>[3]</sup>笔者以清代浙江地方架阁库的变迁,拟对清代地方档案库的设置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清代地方架阁库的研究,最系统的仍数王金玉先生的《宋元明清架阁库纵览》(下文简称《纵览》)一文。王先生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带领郑州大学档案专业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了专题查阅。先后查阅了《浙江通志》等大量的清代地方志,以及雍正《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获取宝贵资料,并得出了“可以断定清代是沿用宋、元、明架阁库制度的”结论。他将所获得的资料,列出了《清代各省架阁库一览表》。<sup>[4]</sup>现将浙江部分摘抄如表1。

王金玉先生根据史料梳理出清代浙江架阁库(黄册库)达36个之多,涉及1个省署、5个府、29个县

表1 清代浙江架阁库一览表

省署	府(州)	县(州)	库名	府州县	库名	建库时间	志书名
《大清会典》户部所记				部分地方志书所记			
布政司			黄册库				
				杭州府	架阁库	雍正八年	浙江通志
				临安县		康熙六十年	浙江通志
				新城县	架阁库	顺治十八年	浙江通志
	湖州府		架阁库				
		乌程县	架阁库			康熙十四年	浙江通志
		长兴县	架阁库			康熙四年	浙江通志
		归安县	架阁库				
		德清县	架阁库			康熙十一年	浙江通志
		武康县	架阁库			康熙九年	武康县志
				孝丰县	架阁库	康熙中	孝丰县志
				安吉县	架阁库	康熙四年	浙江通志
				金华府	架阁库	顺治十年	浙江通志
		金华县	架阁库		黄册库		
		义乌县	架阁库			雍正五年	浙江通志
		永康县	架阁库		架阁库	康熙三十一年	浙江通志
				武义县	架阁库	康熙二十二年	浙江通志
				嘉兴府	架阁库	雍正六年	浙江通志
				嘉兴县	架阁库	康熙二十一年	浙江通志
					黄册库		嘉兴府志
				秀水县	架阁库	康熙十二年	浙江通志
				嘉善县	架阁库	康熙十六年	浙江通志
				海盐县	架阁库	康熙五年	浙江通志
				平湖县	架阁库	顺治十八年	浙江通志

				桐乡县	架阁库	康熙年间	浙江通志
	衢州府		架阁库				
		西安县	架阁库				
		常山县	架阁库			康熙二十二年	浙江通志
		江山县	架阁库			康熙五十二年	浙江通志
				龙游县		康熙十二年	浙江通志
				青田县		康熙十八年	浙江通志
				景宁县		康熙四十四年	浙江通志
				慈溪县		康熙年间	宁波府志
				镇海县		康熙二十七年	浙江通志
		仙居县	架阁库			康熙十一年	浙江通志
				永嘉县	架阁库	康熙十八年	浙江通志

(州)的地方政府机关。王金玉先生对清代地方架阁库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但受历史条件和资料等限制,研究带有粗放性的特点,其成果存在系统性、完整性和严谨性不够的缺陷。

首先,从《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用的雍正《大清会典》看,杭州所属的海宁县,明确记载设有“耳房库、架阁库”,《纵览》却遗漏了。而仙居县,原史料中仅仅记录设有“东西二库”,并无架阁库的记载,《纵览》则误记设有架阁库。<sup>[5]</sup>

其次,从作者大量引用的雍正《浙江通志》看,《纵览》最大的失误是将架阁库建库时间作了错误的解读。雍正《浙江通志》对于浙江每个府县(州)的公署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介绍文字一般都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清代以前的公署情况;二是清以来,历任政府官员在公署建设上做了哪些工作;三是公署的规模及内部结构的描述。而对于第二部分的介绍往往较为具体详细,也是对历任官员业绩的肯定。例如,嘉兴县“国朝康熙六年,知县金墉辟照墙为坊表;十四年,知县梁冲霄重建谯楼;二十一年,知县何鋹重建延宾馆,修葺后堂。”(文中标点为作者所加,下同)又如,秀水县“国朝康熙三年,知县王廷机葺堂署、廊庑、重门;十二年,知县李见龙重修大门。”<sup>[6]</sup>《纵览》清一色地将志书中记录的清代地方

政府最后一次的公署修缮活动当作了架阁库的建库时间。据核实,表1清代浙江架阁库一览表中所有的“建库时间”没有一个与架阁库的实际建设时间相关联。“建库时间”的误读最终给人们造成了清代各地仍然在大建架阁库的假象。

清雍正《大清会典》虽成书于雍正十年(1732年),但其中所收资料却并非都形成于雍正时期。从《纵览》所引用《大清会典》史料分析,文中将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6省所辖府县全部归属到江南、湖广、陕西三大行政区域加以合并介绍,同时又出现“江南江苏等处布政司”、“安徽等处布政司”、“湖北布政司”、“湖南布政司”、“陕西西安布政司”等机构,这分明与康熙六年6省分别独立有关。且“西安布政司”这一机构,历史上仅仅在康熙六年至康熙八年短暂存在过;到康熙八年,西安布政司就更名为陕西布政司了;同年,甘肃布政司也正式命名。<sup>[7]</sup>因此,雍正《大清会典》所引用的该份史料,出现“西安布政司”之名,而无“甘肃布政司”机构,初步断定应形成于康熙六年(1667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之间。雍正《大清会典》所描述的地方架阁库情形,实际是康熙初年的情况,离大清建国才区区20多年。事实证明,雍正《大清会典》在编辑过程中实际选用了一份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档案。

从浙江历史看,明朝的垮台与清朝的建立,其政权的更替,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绝大部分地区是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的。因此,就政府官署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清朝政府机关基本沿用明代政府的地方官署。这一点,在康熙二十三年所编的《浙江通志》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据康熙《浙江通志》记载,当时浙江共分11府1州75县。清朝建立之初,仅仅只有杭州、金华两地的官署遭到损毁,杭州府治,“崇祯五年火毁”,金华府治,“皇清顺治三年毁于兵火”;其余80多个府县的官署都得以完整保留。凡是明代官署保存完好的,清政府机关就“皇清因之”,搬入旧的政府机关办公。<sup>[8]</sup>

架阁库是各级政府官署的组成部分。清初浙江地方政府的官署基本因袭明代的建筑,架阁库自然也在因袭之中,它是明代架阁库的遗存。正因如此,清初,浙江地方政府架阁库普遍存在,这毋庸置疑。而且,清初的各地衙门的架阁库也基本保留了存档的功能。

清初对于明代遗留的架阁库重新进行修缮是有的,重建也有。但是,重建后仍称架阁库的情况很少。据史料记载,浙江仅有镇海县于乾隆十三年在原来旧址上重建,县令王梦弼重建后,“其东间改为架阁库,以贮堂橱版籍,各年征册及辟粮产源流,悉令收架,责总科典守。”<sup>[9]</sup>

清初,浙江80多个府县承接了明代的官署,而据笔者对明代官署的统计,浙江的87个府、州、县中,63个设有架阁库,另有4个设有册库,3个设有黄册库,三者合计,明代的地方档案库多达70个。但是,到了雍正时期,雍正《浙江通志》记录的架阁库已不到30个,不及清初的一半。其中缘由,不外乎或是架阁库已经毁坏或改作他用,或者人们已经不再称其为架阁库了。例如,桐乡县,康熙间“修改架阁科为盐法科”。<sup>[10]</sup>又如,太平县,“左耳房为仪仗库,籍册藏焉,亦名架阁库。”<sup>[11]</sup>

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对公署进行改扩建过程中,将架阁库改掉了。例如,康熙《浙江通志》记载,浙江的11个府治中,除绍兴为黄册库外,其余10个府治均设有架阁库;但到了雍正《浙江通志》中,提到架阁库的府只剩下杭州、金华、湖州、嘉兴4家,其余7个府,“架阁库”均消失了。事实是,在雍正之前,各府公署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建和重修,台州、绍兴、温州、处州、衢州都是康熙年间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府治中,不再使用“架阁库”的名字了。例如,宁

波在雍正九年重建,“堂右为宏济库,旁设库房三间(雍正九年知府曹秉仁重建),又军器库三间。”<sup>[12]</sup>在此,已没有架阁库字样了。由此说明,到了清代,架阁库的概念已经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架阁库淡出人们视野的同时,地方政府取而代之的档案库又叫什么呢?在中央政府机关叫“档房”或“清档房”,但在浙江地方政府中很少出现“档房”一词。据查,浙江的87个地方政府中,称“档房”的只有一个,即嘉兴县。据光绪《嘉兴府志》介绍,嘉兴县的县治中“廊之北为花厅、为书室,南为前厅,西为来鹤轩及档房。”<sup>[13]</sup>

清代,浙江地方政府对于新建或改建的档案用房,并无绝对统一的称呼,一般地方志中用得较多的是“册房”和“书房”。例如:“吏书册房”、“书册房”、“册房”、“册库”;或者称“书室”、“书厅”、“书房”、“书楼”、“书屋”等,即普遍与“册”和“书”相关。

例如,绍兴府在明代建有黄册库,清康熙年间,重建府治,新建的府衙中,既无架阁库,也无黄册库,但出现了大量的“书室”,“由堂之东庑绕出,为陶月轩,后为书室三重”,又二堂“堂后新构书室四间,一纵三横。”<sup>[14]</sup>又如,宁波府在明代建有架阁库,但到了雍正朝,从雍正《宁波府志》看,康熙、雍正后重建的宁波府已无架阁库和黄册库的踪影,取而代之的也是大量“书室”,如“知府宅”有书室15间,“同知署”有书室3间,“同知宅”有书室12间,“通判宅”有书室9间。<sup>[15]</sup>

“册房”、“册库”的名称实际上在明代就有了,原来是“黄册库”的简称。在清代,“册房”、“册库”的功能不仅仅是存放簿册,而是保存一切具有凭证价值的档案,包括土地丈量、司法诉讼、人口赋役等。在清人看来,作为地方政府,公牍等文书虽然有用,但其现实凭证价值,远不及簿册来得重要。在金华兰溪县,“案牍向多灰烬,惟黄册、丈量鱼鳞流水册、实征册存。”<sup>[16]</sup>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县级政府的实际状况。同属金华的永康县,“嘉庆二十五年,署内不戒于火,大堂、川堂、书房、架阁房皆毁。(是年,鱼鳞册皆毁于火,一邑田地山塘,皆无所稽考,刁民猾吏更易于舞弊矣。)”<sup>[17]</sup>这对地方政府来讲,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将新建的档案用房,称为“册房”、“册库”,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例如,嘉庆《西安县志》记载,西安县在明代建有架阁库,清代架阁库废了;乾隆五十九年,县令于“典史宅前隙基建册房一所,贮板图鳞册,”<sup>[18]</sup>用“册房”取代架阁库存



放档案。

“册房”一词,在省级机构应用得最早最广。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清初,浙江总督设了又裁,公署“久空闲日就倾圯”;直到雍正五年,正式提拔浙江巡抚李卫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即成为浙江最高领导,总督兼巡抚;李卫开始大建官署,“雍正七年,建西南平房十五间为总督吏书册房,又楼房二十六间为巡抚吏书册房,俱有扁钥。”<sup>[19]</sup>

“吏书”是清代政府部门中管理书吏的头目。书吏又叫“书办”或“书役”。在清代,每个机构的每个部门,都设有数目不等的书吏,一个部门的书吏头目,称之为吏书。“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因此,书吏实际就是清代各级机关“负责文书起草和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sup>[20]</sup>而“吏书册房”就是衙门内各部门的档案用房。

据地方志记载,在省级机构中,除了叫“吏书册房”以外,还有称“书册房”、“文册库”的。这里“书册房”中的“书”,如果与“吏书册房”做相似解读,应理解为“书吏”的含义。据统计,在所有的省级机构中,有10家单位设有“册房”,详见表2。

清代在黄册等簿册的编制管理上,普遍沿用明代制度和办法。大量的簿册文书都实行多套制管理,即在编制过程中,就产生两份以上,一份保存在当地,一份上缴上级有关部门统一集中保管。<sup>[21]</sup>因此,省级机构中出现大量册房,用以保管下级机构上报的簿册,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浙江布政使司”建有黄册库,雍正《大清会典》也标明“浙江布政使司”拥有黄册库。但是,自清初顺治时停造黄册,“浙江布政使司”的黄册库也改变其用途了,“康熙间,有司蠲谷于此,以备荒欠,”从此,“黄册库”实际已改作粮仓了。“同治四年,布政使蒋益沅重修”成为“积谷仓”,“库遂废”。<sup>[22]</sup>而按察使司的公署从明代因袭来就有架阁库,但自从建了吏书册房后,其架阁库就失去了存档的功能,长期废弃;到光绪六年,“按察使孙家谷改大堂西架阁库为督审公所。”<sup>[23]</sup>以上黄册库和架阁库在清代的变迁,极具典型意义。

“书房”也是清代地方政府保存档案的重要场所。在清代的地方政府公署中,“书房”比比皆是,而且规模都很大。前述绍兴府、宁波府且不论,即使是县级机关,书房规模也不可小觑。以绍兴所属县为例,余姚县,咸丰前有书室十三间;<sup>[24]</sup>山阴县,东院书室“凡五层”,西院书室“凡十余楹”;<sup>[25]</sup>上虞县,虽是同治重建“厅后书室三间,堂之东为书房,四进各

三间”,合计达到15间。<sup>[26]</sup>

在省直部门,许多单位也设置了“书房”,如布政使司有“书室”五间,巡盐察院有“书室”三楹。省直单位中,清初保留“架阁库”的“两浙江南盐运使司”,后来与时俱进,改称“书厅”了。<sup>[27]</sup>

在一个政府机关,建这么多的“书房”,不仅为了藏书,更主要的是为了存放档案。例如,嘉兴府,在嘉庆三年“又重葺书室,为嘉荫轩”,“簿书余闲辄息斯室”。<sup>[28]</sup>古代书的概念与今不同,书不仅仅指的是图书,还包括了各种簿册、公牍、档案等文献资料。

清代地方机关的书房,不光为了存放簿册、公牍和书籍,而且是书吏、幕客们起草文件、办理公务的办公场所,即这里的“书”指的是“书吏”的意思,如(雍正)《浙江通志》明确记载:“雍正十二年,以总督衔管巡抚事臣程元章改建书室三楹,凡三进,以居幕客。”<sup>[29]</sup>

清代地方的架阁库或黄册库向册房、书房转变,这与清代的档案管理制度的发展是相吻合的。与明朝相比,清代档案管理趋于分散化,各部门形成的档案都由各部门自己单独保管。所以,在各级地方衙门中,“册房”和“书房”的数量都比较多,少则五六间,多则十几间,甚至二十几间;它们有的是单独存放公牍、簿册的档案库房,有的除了存放档案以外,同时也是书吏、幕客们起草文件、办理公务的办公场所。由于功能的变化,存放档案的装具也由批量“架阁”开架向单一封闭式双门木柜转变。历史上集中存放档案的架阁库、黄册库,在清代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档案发展的需要了。

总之,清代地方架阁库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基本都是明代建造的,是明代架阁库的遗存。明代对于架阁库的设置作了明确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在建设衙门的过程中,都把架阁库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建设。到了清代,清政府并未像明朝政府那样对于地方政府档案用房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因此,在中央机关,以档房作为档案的专门机构和用房;而在地方,清初基本沿用明代的架阁库制。

对于明代的架阁库,清代基本保留了其原有的存档功能,但除公牍外,书籍图册应是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档案凭据。

清代对明代的架阁库建筑有修缮和重建,但重建以后仍然称架阁库的情况仅限于清代早期。架阁库一词,从清中期开始,逐步退出地方政府的历史舞台。

从清代浙江地方政府看,康熙、雍正以后新建

表2 清代浙江省级机构册房一览表

省 署	册房名称	建设年代	资料出处
总督部院署	吏书册房	雍正九年	雍正《浙江通志》
巡抚部院署	吏书册房	雍正七年	雍正《浙江通志》
提督学政署	书册房	同治四年重建	宣统《杭州府志》
按察使司	吏书册房	同治十年重修	宣统《杭州府志》
两浙嘉松盐运分司运判署	书册房	康熙	宣统《杭州府志》
杭嘉湖道署	吏书册房	同治七年重建	宣统《杭州府志》
贡院	文册库	康熙	雍正《浙江通志》
北新关户部分司署	书册房	康熙	雍正《浙江通志》
宁绍温台分司署	书册房	乾隆前	乾隆《杭州府志》
嘉松分司	书册房	康熙	雍正《浙江通志》

的机关公署,对于档案用房,一般不称架阁库,而习惯改称“册房”和“书房”。其中,省级机构,称册房的多一些;府县机关更多的叫书房。

### 参 考 文 献

- [1]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89.
- [2] 马仁杰,黄伟.清代档案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考略[J].档案学通讯,2014(1):98-101.
- [3] 王金玉.宋元明清架阁库纵览[J].郑州大学学报,1999(3):24-29.
- [4] 王金玉.宋元明清架阁库纵览[J].郑州大学学报,1999(3):24-29.
- [5] 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影印本中华书局,1934:786.
- [6] (雍正)浙江通志[M].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1934:31.
- [7] 康熙六年,将江南左右布政司更名为江苏布政司和安徽布政司,湖广左右布政司更名为湖北布政司和湖南布政司,陕西左右布政司更名为西安布政司和巩昌布政司。康熙八年,西安布政司和巩昌布政司分别更名为陕西布政司和甘肃布政司。
- [8] 赵士麟.(康熙)浙江通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本,2010:5.
- [9] 俞樾.(光绪)镇海县志[M].光绪五年刻本,1879:5.
- [10] 严辰.(光绪)桐乡县志[M].光绪十三年刻本,1887:3.
- [11] 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M].嘉庆十六年刻本,1811:3.
- [12] 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M].道光二十六年重刻本,1846:11.
- [13] 许遥光.(光绪)嘉兴府志[M].光绪五年刻本,1879:6.
- [14] 平恕,徐嵩.(乾隆)绍兴府志[M].乾隆五十七年刻本,1794:7.
- [15] 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M].道光二十六年重刻本,1846:11.
- [16] 陈凤举.(嘉庆)兰溪县志[M].嘉庆五年刻本,1800:3.
- [17] 李汝为.(光绪)永康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重刊本,1932:2.
- [18] 姚宝璩,范崇楷.(嘉庆)西安县志[M].民国六年重刊本,1917:11.
- [19] (雍正)浙江通志[M].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1934:30.
- [20] 马仁杰,黄伟.清代档案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考略[J].档案学通讯,2014(1):98-101.
- [21] 余绍宋.(民国)龙游县志[M].民国十四年印本,1925:35.
- [22] 李榕等.(宣统)杭州府志[M].民国十一年印本,1922:18.
- [23] 李榕等.(宣统)杭州府志[M].民国十一年印本,1922:18.
- [24] 孙德祖.(光绪)余姚县志[M].光绪二十五年刻本,1899:4.
- [25] 朱文翰.(嘉庆)山阴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印本,1936:5.
- [26] 朱士黼.(光绪)上虞县志[M].光绪十七年印本,1892:30.
- [27] 李榕等.(宣统)杭州府志[M].民国十一年印本,1922:18.
- [28] 许遥光.(光绪)嘉兴府志[M].光绪五年刻本,1879:6.
- [29] (雍正)浙江通志[M].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1934:30.